# 《神探之痕迹》的职业叙事与人物塑造

■文/范博禹

自古以来,“物”与“人”之间始终保持着紧密的关系。而这一关系,从早期的工具性使用,经由意义的赋予与阐释,形成一种物的社会生命。在当代电影叙事建构与人物塑造中,“物”既关乎着影像呈现层面,是建构场景、塑造视觉风格的物质性表意符号,更承载着人物在压力情境中作出选择、触发人物内心的深层动机,成为勾联表象与真相、记忆与现实的核心线索。

在2026年国庆档影片中,以痕检专家崔寻的职业生命为叙事主线,《神探之痕迹》依托三起典型刑侦案件搭建叙事框架,将以往着重于案件侦破过程的悬疑类型叙事转化为从勘探痕检“见微知著”的人物精神世界的叙事场域构建。牙痕、断甲、指纹等细小物证屡次成为“破局”关键,影片将叙事重心放置在痕迹的发现、勘验和阐释等过程中,将物证从推动情节发展的工具,转化为叙事表意的核心载体。开篇台词的“经过,就会留下痕迹”,不仅揭示了痕检职业及其学科遵循的科学法则,更埋下了贯穿影片的隐喻:崔寻一生对事实的执着与真相的恪守。

影片最富戏剧性张力的叙事段落,生成于物证悬置、结论阙如之中;办案者直面现实责任与人性追问的裂隙,在精神挣扎中作出行为选择。牙痕案以常规线索失效、侦破受阻为叙事起点,当客观物质性的足迹、指纹无法追踪时,崔寻转而从伤痕中寻找突破。案件侦破的现实困境为影片中崔寻展开的痕检试验——取样、影像固定等痕迹操作的细节呈现,赋予了情节逻辑合法性以及现实紧迫性。反复试验与专业协作呈现了压痕鉴定的探索过程,但作出排除判断后,叙事迅速转向物证与逼供的冲突,对具体鉴定依据的交代相对简略。这一剧情本是突出人物尊重物证的职业立场,然而却使鉴定结论的可信性更多依托其专业形象。如何在表达人物立场的同时,使关键鉴定判断在影像叙事中获得充分支撑,是这一段落仍需深化之处。

第二桩典型案件——断甲案,叙事重点从牙痕案常规证据失效后的方向探索,转向获得关键线索后,承担不确定性风险的压力情境与内心审视。崔寻等人继续采样,比较不同个体的指甲纹线,并考察生长过程中的变化。两片指甲的纹线相合,与确认一种鉴定方法是否可以成立,所需回答的问题并不相同。电影让工作在取得有利发现后继续,观众便能够理解,接下来大量采样的意义在于检验这种相合是否足以支持判断。这一处理方式,重构了案件的叙事节奏,超越关键线索浮现后成果确认带来的情绪高潮,那些在过往叙事中被遮蔽的大量时间、人力投入,角色承担的验证未必成功的不确定性风险,丰满了职业叙事与人物内心的细节塑造。技术探索的不确定性由此构成叙事进程中的中介性元素,携带着推动破案与阻碍侦破一体两面的张力属性,而崔寻尊重证据的职业品格,恰恰具象化为愿意将初步判断交由严苛检验的行动选择。

爆炸案中的位置演示和对座椅残片的追问,以可视化方式清晰呈现了逻辑推演与实物物证之间的边界关系。参与勘验的人员在车体内坐下、蹲身,以身体为尺度勾勒空间关系,在这一过程中,抽象的爆炸位置推演转化为观众可感知的现场情境。但这一可视化方式并未直接指向既定真相,用于固定炸点的座椅残片并未寻获引发对炸点位置推演的质疑,也在此牵引着观众的叙事注意机制。这种情节层面的对照,不仅构成一种叙事转折,也持续通过“缺失物证能否找到”“既有推演能否成立”的反复追问,使得案件保持着叙事张力,悬念的生成不再仅仅依赖于凶手身份的遮蔽,而是源于一种由影像叙事建构的思想实验。

爆炸案检验场地中横向排列的工作台与并排作业的人员,使影片的视野从崔寻一人扩展到共同处理物证的工作人员。手部操作、镊子与细小检验材料的特写镜头,又将受众注意力引至细致的台面操作。开阔的群像场景与精细操作的特写镜头形成影像互文,既交代案件所需调动的人力规模,也赋予了职业从业者劳动的影像可见性。那些未被赋予完整人物弧光的普通从业者,仍通过持续的劳动在叙事进程中获得“一席之地”。而崔寻的专业能力被置于集体劳动的支撑网络中,技术突破超越了一种个体天才式的灵光闪现,解构了“神探”的个人英雄叙事,进而呈现为一种集体主义叙事的职业图景。

在共同作业场面中,黄仁德的几次关键判断进一步书写了核心协作者的专业价值。从质疑牙痕方法到参与牙模实验,黄仁德的行动使专业协作建立在持续求证之上。她依据伤情鉴定回应刑讯指控,又使同伴支持以检验结果为依据,人物关系由此在质疑与互助中展开。相较于工作台群像所呈现的宏观劳动图景,黄仁德的一系列行动进一步诠释了痕迹职业中个体独立专业判断与坚定信念的重要价值,也在多元的人物性格、心理与职业精神塑造中,通过对主要人物提出质疑、形成其关键行动阻力,与主要人物之间构成一种巧妙的博弈关系。在这种具有张力性的互动模式中,人物孤光的塑造模式从常规的平行并置,转化为持续的交织共生。

断甲鉴定的方法验证仍在推进时,王卫国已将自己的身家前途押在这项判断上,要求崔寻给出必胜的保证。科学认知的有限性,与现实生存风险之间的矛盾,构成了本片核心的伦理情境。崔寻承认无法保证,却表示可以陪他一起输。他所承诺的是共同承担后果,至于鉴定的结果,仍须由尚未完成的工作来回答。这段对白处理了一个并不容易的处境:若为了安慰同伴而保证成功,专业判断便会迁就情感;仅仅强调结果未定,又不足以回应同伴面临的风险。崔寻将自己的承诺限定在能够负责的事情上,审慎因而没有成为疏远同伴的借口。两人随后让手中的食物与保温杯相碰,这个近于碰杯的动作,使职业审慎与同伴情义在具体行动中相互支撑。

崔寻这一主要人物的塑造贯穿数桩案件,但其塑造方式并未简单遵循着与案件“发现—受阻—侦破”保持同频节奏的“英雄之旅”经典叙事模式,而是依托不同伦理情境之下人物对职业原则的坚守,实现银幕想象的勾连。人物自身的行为逻辑与同伴关系,为几个相互独立的案件单元搭建起内在的人物叙事纽带。前期的取样与求助,呈现其工作方式;共同承担责任之后,重点塑造其职业审慎与同伴情义交织下的心理转变;“搜家”则进一步书写履职对私人感情的冲击。同样是恪守物证优先的判断逻辑,但崔寻所承受的现实压力逐层递进,观众也由此完成对人物精神世界的渐进式认知与情感共鸣。

表彰后的空礼堂里,崔寻胸前佩戴红花,王卫国却对自己拼命办案而“功过相抵”感到失落。这种落差与一个办案者希望付出得到承认有关,王卫国向老友诉说不平,也是在寻求理解。关于人情往来的责问,又让分歧延伸至二人的日常生活。这一番倾诉裹挟着对荣誉分配的现实感受与世俗人情观念,不能简化为个体的名利欲求;崔寻所面对的,正是个体期待、职业期待、社会期待矛盾碰撞之间迸发的鲜活人性,而这一矛盾碰撞以二人对话予以戏剧性转化。然而,崔寻从核心台词“经过,就会留下痕迹”引申至做人准则,援引师长教导,暴露了该片在职业伦理阐释上过分依赖台词宣讲的局限性。与“陪你一起输”所面对的具体风险相比,这部分台词更多是在申明应当遵守的原则,对人物选择的解释略显生硬。

《神探之痕迹》最富感染力的叙事,恰恰集中在崔寻在理性求证中恪守审慎、在同伴陷入困境时愿意共担风险的“人性高光”时刻。高超的专业能力并未让他豁免现实困境,私人情感的牵绊也让合乎法理的抉择背负精神重量,由此揭示物证与人心、情理与法理之间充满张力性的裂隙。正是完整保留了困境与痛感的叙事段落,使崔寻的职业坚守摆脱了符号化的塑造,获得了现实主义书写打动人心的叙事力量。

(作者单位:河北传媒学院)

中国电影艺术研究中心
电影文化研究部专版

# 《三星堆:未来往事》:AI的自白与自省

■ 文/周 舟

《三星堆:未来往事》讲述的是人类对人工智能的重度依赖甚至滥用带来毁灭性灾难的故事,旨在讨论“科技限速”这一技术伦理问题:科技发展要以人类和人类社会能够承载的程度为上限;科技发展的目的是助力人类发展而非替代人类自身发展,工具应当拓展人的边界,而不应造成人类自身的萎缩。

这个立意在当下很有价值,由《三星堆:未来往事》这样一部全AI生成的作品娓娓道来,颇具自反意味。片尾还有彩蛋:摄制人员扛着摄影机,抱怨光线不足、制片经费不够等传统影视创作会遭遇的现实困境,反讽的意味更浓了。

这感觉就像——香烟盒上“吸烟有害健康”的标识。

## 观感

从片头放映许可证上可见,影片归类为动画片。人类动画伴随技术进步走过很多阶段:从最早的手绘,到后来的CG,还有动作捕捉。如果把AI看作动画生成的一种手段,它和手绘差别极大,相对而言更接近CG动画或者动作捕捉,或者动作捕捉与CG二者的融合。

所有技术工具都有自身的强项,也有技术局限,并最终依托这套工具的强项与局限生长出独属于它的美学或匹配工具特性的艺术属性、艺术门类。从这个角度而言,起码目前我还没看到AI作为一种技术,形成它清晰、独有的技术属性。

仅从《三星堆:未来往事》目前呈现出来的视觉观感来说,最明显的观感就是画面的景深感不足,前景和后景的层次弱于常规动画。《三星堆:未来往事》包含大量宏大恢弘的场景,本应具备饱满的空间纵深,但成片的立体层次稍显单薄,这可能与AI技术迭代的阶段有关。

不久前我还看过一部美国AI平台、哈萨克斯坦主创团队联合制作的全AI生成影片《地狱磨砺》(Hell Grind),其景深感更优,当然跟传统CG动画电影比还是不行的。我猜想原因是欧美影视工业自20世纪90年代起,历经三四十年的CG、绿幕、动作捕捉、三维建模迭代,积累了极其完善的工业流程、数据库与调校经验。这套成熟的三维制作体系,迁移至AI影像创作中,使其画面前置数据建模、后期调校、画面修正、空间校准的精度,高于现阶段的国产AI影像作品。

同时,两部影片也展现出中外创作者对AI影视应用的不同定位。《三星堆:未来往事》偏向半剧情、半科普,将AI算力与创作重心大量用于古文明奇观铺陈、时空穿越的景象奇观营造;而《地狱磨砺》是标准的超级英雄类型片,将AI技术完全聚焦于多元画风、“高燃”打斗、特效场面的创作。二者的创作侧重,也代表了全球影视业AI技术运用的两种核心探索方向。

## 用法

观影过程中,我一直在思考AI作为一种技术手段应当如何更合理地利用。在我看来,AI最重要的价值是优化制片配比,它擅长用低成本、短时间快速产出达到行业平均水准的基础画面,适配全景、中景、远景等功能性过渡镜头。在传统影视制作体系中,占比高达七成左右的基础镜头,会消耗剧组大量经费、时间与创作心力。但对观众而言,真正形成记忆点、支撑影片质感的,往往只有两三成的“高光”重头戏。AI影像最合理的工业价值,是优化影视制片结构、解放创作生产力:由AI承接标准化、流程化的基础叙事镜头,将创作者七成以上的心力、资源与时间释放出来,集中打磨关键高潮、情绪核心、视觉亮点等画龙点睛的段落,实现“基础镜头标准化、高光段落精品化”的创作分工。

我认为人脸特写是最不适用于AI的部分,人脸特写之于电影的重要性毋庸讳言,它不只是呈现细节,更承载情绪、带动观众共情,是叙事里极其关键的一环,古典好莱坞甚至会专门用一个棚精心打磨明星的特写镜头。我们能够共情人物的悲伤、喜悦,前提是存在一个基础的情绪锚点——对方与我们是同类。一旦我们明确意识到这个形象并不是真实的人,这种共情的建立就会变得非常困难。技术合成的人脸缺少能够唤起观众情绪共鸣的机制,甚至越逼真越令人产生心理厌离,这个问题在动作捕捉时期的《最终幻想》《贝奥武夫》就曾经遭遇过。

而且目前阶段AI作品里的人脸,无论是中国制作的《三星堆:未来往事》还是国外制作的《地狱磨砺》,角色面孔均为“标准脸”——标准、对称,挑不出毛病。因为现阶段模型抓取的多为“高质量人脸”,又在去噪过程中倾向于生成人脸数据集的“平均脸”。模型不会主动采样分布尾部(歪鼻、大小眼、不对称嘴角),因为那是低概率区域,去噪会把它拉回均值。等于说AI是在“好看的人”里再求一次平均,得出“平均好看脸”。真人面部左右不对称度(眼距、嘴角、眉峰)通常在5%-10%;主流扩散模型生成的脸不对称度常小于2%,接近“理想模板”。从美学层面来说,这种统计学意义上的完美、均衡带来空洞感,根源在于:我们对一张面孔的识别、共情,恰恰锚定在那些属于个体的“偏差”之上。那些轻微的不对称、独有的骨骼起伏、细微的软组织落差,不是缺陷,而是生命个体在遗传、成长、情绪、经历里留下的印记,是主体性的视觉载体。当所有偏差都被抹平,面孔只剩下统计学上最优的均衡,它就失去了独属于“这一个人”的叙事线索。越完美,越没有可供解读的个人故事,疏离与空洞感便由此而生。

还有一个共性问题存在于《三星堆:未来往事》《地狱磨砺》中:对新技术的过度使用。就像20世纪70年代流行的极速推拉镜头无处不在、有声片刚问世时的全片聒噪,新鲜感驱动创作者不断试验,加之长期匮乏带来的补偿心理,过度使用几乎是每一种新技术问世早期的常态。

《三星堆:未来往事》《地狱磨砺》呈现出同样的倾向:AI消解了传统制片的限制,挣脱经费、工序约束之后,创作者过度释放想象力。影片频繁穿插时间线、跳转空间,在不同时空、叙事线索间不知疲惫地穿梭。AI不会累,可是观众会,高频切换持续折损叙事信息,奇观所带来的兴奋达到阈值后边际效应递减,观众渐趋麻木、疲惫,还有跟不上繁复叙事的挫败感。借用前文技术限速的话,影视技术的革新也需以观众承受值为上限。

我相信,等好奇心褪去,创作者会变得审慎节制,甚至主动做减法,逐渐学会取舍,将技术精准运用在适配、出彩的场景,而非全程堆砌。影视技术的成熟过程,就是从“滥用技术”到“节制用术”的过程。

影视创作的美学也往往诞生于“限制”之中。骈文、辞赋的格律美学,影视行业的特摄美学、有限漫画、德国早期室内剧美学,这些独特的艺术风格,几乎都是在严苛的条件限制、资源匮乏中打磨成型。

## 故事

《三星堆:未来往事》拥有一个极具深度、潜力的创意,可惜浅尝辄止、未能充分挖掘展开。影片设定了“技术特权与信息特权”的未来图景:未来超脑企业研发出大数据AI模型,可预测七日之内的关键事件,用户可高价订阅服务,依靠AI预判风险、抉择人生关键节点。

这个设定是绝佳的叙事容器,能够容纳阶层分化、贫富差距、社会矛盾、技术伦理,同时承载丰富精巧的叙事机巧。诺兰、丹尼·博伊尔、奉俊昊这类擅长借科幻外壳探讨社会议题、玩转时间结构的导演,会很喜欢这个设定,有充足空间在此大展拳脚。

从这个设定往下推想,比如订阅是可以分级的,A档权限可预知七天,B档权限可预知五天,C档权限可预知三天,这套分级订阅机制就天然制造了叙事艺术中非常重要的信息时间差。长短不一的预知窗口,能生出精彩的戏剧线索与矛盾冲突。手握更长预知时长的人,拥有先发布局的优势;权限更短的人只能追赶有限线索;无权限者对将要发生的一切一无所知,会形成由数据、算力、技术权限构建的全新社会阶层割裂,同时信息差本身也可以支撑起多方博弈、悬念迭起的故事线。

这一议题涵盖了科学、社会学、人类学、科技伦理、人性异化等多重维度,完全可以此为基底构筑一部有深度、高格局的“硬核”科幻作品。而《三星堆:未来往事》中将这一设定仅作为浅层叙事线索,在我看来,是整部作品最大的遗憾。

# 于烟火褶皱里寻自愈力量
## ——评电影《活色生香》

■文/胡 冰

电影《活色生香》讲述的是三位普通中年女性的生活境遇,以平实细致的叙事直面现实困境,在挫折困难中寻找生活正向力量,以温暖治愈的视听表达与诙谐幽默的轻喜剧风格,将人生低谷、孤独困境与自我疗愈徐徐铺展,为当代观众提供了豁达自洽的生活启示。

影片最具价值的是敢于直面现实生活的困境,不粉饰人生、不回避缺憾。电影《活色生香》围绕蒋芳芳、薛宝梅、梁美心三位中年女性各自的人生缺憾、挫折与狼狈展开,展现普通人在遭遇生活中的苦难后依旧热爱生活,励志又治愈。片中的蒋芳芳一片真心奔赴爱情,不料遭遇情感的欺骗,付出全部终成一场空;梁美心长久深陷于失去爱人的哀伤,很长一段时间默默地承受着孤单的煎熬;薛宝梅大胆追求爱情,不料招来流言蜚语,承受外界的误解与非议。三人各自背负生活的困顿、狼狈与委屈,会彷徨、会不安、会自我怀疑,真实还原了普通人遭遇困境、陷入迷茫、跌落谷底的常态。影片不刻意安排戏剧性的翻盘,也不编造一蹴而就的圆满结局,而是忠实呈现生活的坎坷与变数,故事扎根现实、直击人心,很容易让观众与之产生共情。

可贵的是,该片坦然面对困境,却不一味陷入消沉,而是于逆境中打捞温暖与希望。它承认生活的痛,却拒绝消沉。面对情感背叛,蒋芳芳经历痛苦煎熬,终选择清醒释怀、重新生活;面对漫长孤独,梁美心慢慢打开心扉,走出封闭的自我;面对外界误解,薛宝梅在委屈过后依旧保持对爱的勇敢追求,保持真诚热忱,笑对生活。影片传递出核心生活哲理:低谷的沉潜,是慢慢生长的契机;遭遇挫折之时,也是向内疗愈的时机。正如片中所言:“难过就是好过的引子,熬过难过,一切就会慢慢好起来。”生活虽有起落浮沉,但只要心怀热爱,平凡日子也能重获温暖与光亮。

在艺术审美层面,《活色生香》以温暖柔和的视听色调构建治愈氛围,极大削弱了失意的沉重感。画面整体采用温润明亮的暖色调,生活化的街巷、居家场景、闺蜜相聚的日常光影柔和细腻,营造出烟火氤氲的温柔氛围。影片配乐清淡舒缓、旋律内敛治愈,摒弃刻意煽情的悲壮编曲,贴合普通人平淡真切的生活节奏。温暖的画面搭配柔和的配乐,共同形成哀而不伤、包容温和的审美基调,观众在看见生活种种困境的同时,始终被暖意环绕,由此体会到光影艺术独有的治愈力量。

该片最具特色的艺术表达,是生活化的轻喜剧叙事风格,以幽默消融苦楚、以松弛纾解沉重。影片的笑点不靠夸张闹剧,而是扎根于鲜活的人物性格与生活化的细节。三位主角性格各具特点,反差鲜明:薛宝梅天真执拗、稚气可爱;蒋芳芳直爽泼辣、嘴硬心软;梁美心温柔内敛、安静沉稳,三人的性格碰撞自然生出趣味与“反差萌”。同时,闺蜜间轻松诙谐的打趣陪伴、相亲途中的“乌龙”插曲、生活里有趣的细碎小事,都以轻喜剧的方式软化了人生的伤痛与窘迫。影片实现了“悲喜相融、苦而不郁”的叙事效果,让人物在笑声中释怀、在温暖中自愈,也让整部作品始终保持明亮松弛的基调。

透过真实的现实描摹、温暖的视听表达与轻松的喜剧叙事,影片诠释了“活色生香”的真正内涵。所谓活色生香,不是一帆风顺、风平浪静,而是见过生活的残缺与风雨,依旧拥有热爱生活、勇敢前行的底气。人生难免遭遇孤独与迷茫,而成长本就是接纳自己、疗愈自己,与自我和解的过程。

可以说《活色生香》是一部温暖且有力量的现实治愈影片。它直面现实困境、挖掘正向价值、构筑温暖审美,巧妙的轻喜剧表达让观众明白:所有难熬的时刻都是奔赴向好的序章。心中守住光亮,从容地接纳与疗愈,每个人都能在平凡烟火里活出独属于自己的热烈坦荡、活色生香。

(作者单位:中国传媒大学电视学院)